

一所大学里的文化氛围,从根本上是由大学里的人决定的。
我们在感叹高校书店的消亡时必须认识到,是学生让它们消亡的,从根本上来说,是老师和老师一起令这些书店消亡的。

校园书店还需要政策解救吗？

■本报记者 韩琨

近日,有外媒称,电商巨头亚马逊正计划在美国西雅图 University Village 购物中心开设一家实体书店,目前已有建筑工人正在装修施工。而与之相对应的大洋彼岸,位于北京海淀的高校密集区,实体书店尤其是高校内的校园书店却越来越萧条。

今年秋季学期伊始,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高校校园书店基本情况调研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组织所在地高校认真调研所有高校内校园书店的基本情况,“确保无遗漏”。

被视为高校文化地标的校园书店生存境况越来越差,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主管部门似乎也无意帮扶。但问题在于,仅靠政策能改变这种情况吗?

“情况越来越差”

“说起校园书店凋零这个话题,都有六七年了,情况越来越差。”位于海淀区的某家校园书店的店主王嘉(化名)向《中国科学报》记者无奈地表示。

按照王嘉的看法,校园书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他心中称得上“书店”的书店,即没有兼作咖啡馆之类的任何副业、不卖教材教辅类的纯粹书店,另一类则是主营教材、英语及各类专业培训考试材料的教辅书店。前者以北大汉学、野草、博雅堂等为代表,后者以在北京多家高校均开设分店的宏途书店为代表。而这两类书店在高校内的生存空间均不断遭到挤压。

“汉学书店已经关张了。”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陈迷告诉记者,他说的正是曾经的北大书店“三剑客”之一——汉学书店,也是王嘉口中的第一类“真正的书店”的代表。在北京大学校园内,蜗居于地下的物美超市旁的这几家书店,是陈迷从本科起就常去逛的书店。如今,陈迷看着这些店日益经营惨淡,说起来也有几分伤感。

如王嘉所说,面对电商的冲击,实体书店的日子并不好过,是整个行业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出台一些政策优惠,希望加以扶持,的确算作积极信号。“但实际操作起来,可能没什么用。”王嘉毫不掩饰自己的悲观。

谈起 9 月初教育部办公厅下发的高校校园书店调研通知,按照《通知》的要求,9 月 25 日是提交调研情况的截止日期,摸底调研理应结束。然而,王嘉表示,并没有任何相关人员前来调研。

按照教育部办公厅的要求,各地教育主管部门须对所在地区高校内校园书店的数量、规模、书店性质、经营状况都加以了解、调查,虽然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没有表示后续政策,但此举普遍被解读为政府部门即将扶持校园书店的讯号。

“即使有关部门真有这样的政策,考虑倾斜,即使我们这样的书店符合政策,扶助和支持也不见得会落到我们的头上。”面对可能有的优惠政策,身为书店店主的王嘉显得十分冷静。

如何维护高校文化地标

王嘉的冷静并非没有理由,已经发生的现实让他看到,政策的作用往往没有成效。

2012 年,上海市政府就出台了扶持发展实体书店的计划,并付诸实施;杭州市政府也出台了每年出资 300 万元,以资助、贴息、奖励等方式扶持发展实体书店的政策。

就在去年,北京市海淀区也出台了《海淀区扶持书店行业健康发展暂行办法》,宣布从 2014 年起,北京市海淀区将每年出资 400 万元,扶持实体书店发展。但从从业者王嘉的感受出发,实体书店的情况并没有因此有什么起色——尤其是他所经营的这种“真正的书店”。

于是,王嘉选择在守着店铺的同时拥抱网络,“我也经营网上书店”。在采访中,他向记者坦言,如今,“开书店真的不赚钱”。

至于主要经营教材教辅类书籍的校园书店,如今更是不复往日。以宏途书店人民大学分店为例,这家书店已经从校园中心搬迁到了东门附近的小角落,顾客也少了许多。

“很多人把高校实体书店誉为学校的‘文化地标’,这实在是过誉了。”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至少,大部分校园书店是担不

起“文化地标”这个称号的。

在这里,熊丙奇指的是那些专卖教材和各类工具书,服务于学生考研、考公务员以及英语、计算机学习的书店,这类书店的经营宗旨较为功利,并没有承载多少文化功能。

“即使有政府扶持,学校采取减免房租等救助措施,一旦学生能在网上购到更便宜的图书,这样的书店倒掉也是迟早的事。”他说。

陈迷则告诉记者,就他的观察和体会而言,网购越来越方便且价格便宜是主要原因,“尤其是教材、教辅,考试培训类书籍这方面,现在大家都越来越精明,未必买全新的,二手书市场是更为划算的好选择。”时常帮导师订购书籍资料的他,出于方便,也都按照导师的意思通过电商购买。

北京某“985 工程”高校的一位教师向记者笑道:“我们学校里的书店都纷纷转型咖啡馆了。”这句有些开玩笑的话却反映了如今许多校园书店探索的转型道路之一。

在王嘉这种人文情结深重的书店老板眼中,“咖啡馆”“阅读角”之类打造卖书之外特色服务的方案并非正道,但却得到了一些专家以及学生的肯定。

比如,熊丙奇就表示,政府扶植总归不是长远之计,多举办讲座、沙龙、分享会等活动有利于校园书店打出富有特色的“文化”牌,吸引更多的读者。陈迷也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佐证,时常举办讲座、沙龙、读书会等活动的书店,的确人气更旺。“我去参加活动的时候往往会顺便买几本书,例如万圣节就有很多沙龙活动,书店发布的畅销书榜也会引发我们买书。”陈迷说。

反思功利化教育

记者比较了王嘉店里一些书籍的售卖价格,大部分图书在七折左右,价格并不高于网店,而特价区的一些书籍更是以四五折的低价待售。电商以价格优势取胜的说法在这里似乎并不适用。

店铺租金高企,光顾书店的爱书人一天却没几个。被问到顾客少似乎与图书价格关系不大时,王嘉难掩心中的激动:“海淀区高校这么多,剩下的还有几家?当然不仅仅是电商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现在没有读者了,买书的学生越来越少了。”

王嘉心中对读者的定义有他自己的标准,专指那些真正爱读书、不功利的人。而他这家以人文类书籍为主的书店,迎来的读者越来越少。他觉得无可奈何,却也难掩失望:“现在的学生都不读书了。”

虽然身为学生,陈迷对于“现在的学生都不读书了”这种略带批评意味的说法也无法开脱。“我身边的同学的确爱逛汉学、野草这类的不多,图书馆里都是看雅思、托福、GRE 和各种专业课的同学,读‘闲书’的越来越少。”

“这就是学生阅读的功利化问题。”熊丙奇直白地点出。

在他看来,一所大学里的文化氛围,从根本上是由大学里的人决定的。他说:“我们在感叹高校书店的消亡时必须认识到,从根本上来说,是学生让它们消亡的,或者说,是学生和老师一起令这些书店消亡的。”

按照熊丙奇的想法,有人文氛围的书店应该得到政府或者学校方面的资助或者优惠政策,另外,学生们应该把这类书店留下来。”

然而,在现实中,王嘉的书店根本无法依靠每日来自学生群体的零散客源维持生存。换言之,学生的阅读习惯慢慢导致这类书店生存艰难。

“学生们应该慢慢改变自己的阅读习惯,以实际行动支持应当留下来的好书店。与读书相关的学生社团也可以在这方面做点事,与书店共同开展一些定期的读书分享会等活动,在学校里引导一种爱读书的氛围,从而改变大家的阅读习惯。”熊丙奇说。

“学生阅读目的功利——只关注工具书;参与社团活动也功利——在很多大学校园里,诗歌、文学、戏剧等社团或消失或不温不火,红火的是就业、实践、创业类社团。”这一切,在熊丙奇看来,根源于此前中国学生们接受的基础教育。“中小学的教育评价体系导致了学生们没有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都在功利化地读书。”因此,他认为,要留住所谓的高校文化地标,改变大学生的阅读习惯,就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小学教育等一系列教育评价体系。除此之外,大学也要肩负起重任,“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

从高等工程学院到荣誉学院——北航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纪实

■本报通讯员 万丽娜 徐墨客

2015 年,是“钱学森之问”提出的第十个年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工程学院在送走第九批本科毕业生后悄然转身,被正式确立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荣誉学院(Honors College of Beihang University)——这是北航为“钱学森之问”交出的新答卷。

“北航要搭建荣誉教育平台,统筹设计理科和理工交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框架,整合人才培养存量优势,引进全球优质教育资源,全力构建荣誉课程群和荣誉师资队伍,实现教育优质资源的集中投放和开放共享,推行荣誉教育制度,发挥荣誉激励作用,为国家培养具有远大理想、高尚情怀、国际化视野和一流竞争力的创新型人才和学术领军人才。”中国工程院院士、北航副校长兼高等工程学院(荣誉学院)院长张广军说。

强化基础,突出个性

每周四下午 2 点,北京大学基础物理教学名师舒幼生教授都会准时出现在北航沙河校区五号教学楼 101 教室,为高等工程学院的学生破解物理学的奥妙。走上二楼阶梯,巴黎十一大学特级教授贝黑叶正滔滔不绝地为华罗庚班的学生讲解《概率论》。二十公里外的北航学院路校区,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研究员以全新的方式为计算机试验班讲授现代程序设计课程,教室里挤满了慕名而来的旁听者……优质的教育资源汇聚成为北航高等工程学院(荣誉学院)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强大力量。

高等工程学院(荣誉学院)本科培养学制为四年。开学前一周开设暑期预备学校,对新生进行导学,学科带头人进行专业介绍,为后续渐进式专业分流作好铺垫。

第一年,全体学生统一进行高水平理科基础教育和通识教育;第一年暑期作为第三学期

开办暑期学校(不低于 6 周),学生进行相关专业基础课程学习和训练,强化知识和能力储备,为全面开始专业学习提供支持。学院统一开设的理科基础课程和通识课程,均为经过单独设计、按照基础学科拔尖学术人才培养要求量身定做的荣誉课程,由学院聘任的高水平师资,按照小班化规模讲授。

从第二年开始,学生根据能力和意愿进行专业选择,部分学生经过遴选进入数学(华罗庚数学试验班)、物理、化学、生物和计算机等基础学科专业,实施相对独立的培养方案;其他学生选择各类工科专业,实施全新设计的、注重学科交叉融合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学生在确定专业方向后将从全校优秀专家、学者中选择专业导师,在其直接指导下完成后续专业学习和实践。

午后阳光照射下,中关村丹棱街显得格外耀眼。微软亚洲研究院一个窗边的工位上,夏乔林正在从容地调试刚写好的程序。三个月后她将进入北京大学信息科技学院攻读计算机硕士学位。两年多前,从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转入计算机专业还仅是她的一个冲动的念头。是学院的大力支持令她扫除了惶惑,导师的悉心指点为她引领了方向,这位年轻女孩迅速成长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新生研究力量。

“数理不仅是技术的基点,而且是倍增器,基础高一分,技术创新可能高十分。凡是重大创新无不是在数理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尤其是原始创新;我们不给学生设天花板,学生有多高的需求就提供多高的教育平台;不设围墙,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开放的培养环境。”北航原副校长郑志明说。

国际合作,书院育人

“学校大力支持学生到世界顶尖大学参与

课程学习和项目研究,海外游学‘远航计划’将作为荣誉教育的重要延伸和有益补充,为学生获得广博的阅历和更高的视野提供平台和机会。”张广军在谈到学生海外游学经历时表示。

学院既通过开设部分双语课程,聘请国际师资授课等方式将国际化教育资源“引进来”,又提倡学生“走出去”,鼓励每名学生在大学期间都有出国(境)交流经历,为符合条件的优秀学生提供国际一流大学一年以上学习机会。

学院自 2007 年起每年组织暑期香港学术交流团、暑期英国高校学术交流团,高年级学生出国(境)学习交流比例达到 50%以上,本科毕业出国(境)外深造比例接近 30%。此外,学院还依托独特的书院环境,加强对学生的精神培育和人格塑造。

近年来,学院依据其独特办学模式而自成书院,以“汇融”为名,取“汇集英才、融通学问”之意。实际办学中,书院与学院紧密耦合、双位一体,秉承“博而有要、雅而有节、敏而有蕴、卓而有徒、果而有毅”的育人理念,通过双导师制、四化育人(思想思辨自觉化、社会公益常态化、创新培养全程化、自我管理立体化)等教育手段,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成人、成才。

正在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栗蓓,是一个用行动诠释理想的人,品学兼优的她 是北航学雷锋典型、北京市五星志愿者、2013 年度“最美北京人”。作为高工 2011 届毕业生,她自入学起便坚持无偿献血,探视和照料北京松堂临终关怀医院的老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感悟生命的意义;怀着对社会感恩之心,她于 2011 年 8 月加入北京(LEAD)阳光志愿者俱乐部,独立运作专注于为流动儿童教育提供志愿服务机会的纯“草根”志愿者组织;作为绿化志愿者,她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浑善达克沙地深处沙漠中撒下了上万棵绿色的希望。

北航高等工程学院(荣誉学院)党委书记陈

中国大学评论

从问题选择角度看,教育研究大约有两个大方向。一是选择宏大问题,比如“中国的教育是否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比如逻辑很严谨、但有些拗口的问题“教育的中国问题还是中国的教育问题”等。这一方向的研究高大上,往往倾向于从根上找问题,有时会发现教育思想、体制等从根上就错了,需要彻底推倒重来。但如果研究过教育史而看到我们曾经推倒重来的历史效果,有时会冷静下来而将这类研究的价值仅仅归结于某种“启发性”。

按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先生的说法,“教育最困难的不是发明一种想法,而是将一种观点种入人的心中”“教育天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工作,是成熟的人与懵懂的人之间的关联”。这一说法努力把握教育的本质,还附带说明了教育变革的困难。仅从学校教育看,教育变革首先需要成熟的教师在内心深处发生或者认同变革的思想,然后方能将新观点种入学生的心中。但是教师已经成熟,他的观点已经定型,或者说陷入范式陷阱之中。使成熟的教师产生或者认同变革,谈何容易!

因此,有效的教育变革往往渐进而缓慢,积久方能见功,因为要促使已经成熟的教师否定其原有框架而认同变革、或者激发出教师自我变革之心,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时间。有时要耐心地等待十年、或者二十年以上。美国耶鲁大学上届校长理查德·莱文(Richard C. Levin)任职时间是 1993—2013 年,整整 20 年。这就是为何超过十年的任期是校长成就教育家伟业的基本条件,也是一个我们没有遵守的教育规律。我们的校长任期如果匆匆几年,他们如何来得及将新观点种入已经成熟教师的心中呢?

教育研究的第二个方向是秉持改良的思想,持续不断地研究一些小问题,希望借由小问题的持续研究与实践,促使教育稳定缓慢地变革。这类研究很难激动人心,短期也很难见功。例如,对于当下“寒门能否出贵子”的问题,就有一些学者持续认真地研究,重要的研究者包括杨东平、丁小浩、谢维和等,研究视角和采用的数据基础各有不同,有的从大型社会调查数据入手,有的从一个小省的学籍数据入手,有的从几所高校的少量问卷与深入访谈入手,有的从大学生的学习成绩客观数据入手,有的从农村基础教育田野调查入手。多种角度的研究综合在一起,使得问题逐步清晰,政策变革的方向也就清晰起来。

我们现在又遇到一个小问题需要认真研究。2015 年 7 月,国家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学位证书和学位授予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决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颁发给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获得者的学位证书开始由各学位授予单位自行设计印刷。可能被忽略的是该文件第十八条:“学位证书是否制作外文副本,由学位授予单位决定。”由于有些高校春季有硕士、博士毕业,因此是否制作学位证书外文(主要是英文)副本的问题,已经急迫地摆在各高校面前。在此,笔者呼吁,为学位证书发放英文副本吧!

为学位证书发放英文副本,主要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基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需要而逐步呈现的更广泛需要。对于学生而言,持有学位证书的英文副本,可以方便学生在未来的求学旅途中,更方便地在世界范围内申请研究生入学机会。在就业方面,证书的英文副本可以方便学生,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国内的外企就业。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随着国家和各地政府扩大来华留学生政策逐步落地,中国期待更多来华留学生到中国留学。对于来华留学生而言,获得学位证书的英文副本对于他们继续升学、求取更加重要,这一决策也将促进各高校招收更多留学生。例如,在教育质量基本相同的情况下,A 高校决定为学生发放学位证书英文副本,而 B 高校不发放,来华留学生应该选择哪所高校呢?

为学生发放学位证书的英文副本,也将普遍地节省学生个人、高校和国家的行政成本。目前,学生毕业后在求学、求取过程中如果需要英文学位证明,还要额外向学校研究生院、教务处申办学位证书的英文证明文件,高校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也要额外聘用人员,学生和学校都增加了成本支出。有时,来华留学生还需要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证明。

从教育史上看,为学生发学位证书的英文副本并不是彻底革新,而是恢复我国高等教育的传统。在研究钱学森先生时,笔者看到,1934 年(民国二十三年)7 月 1 日,国立交通大学(上海交大前身)在给钱学森颁发中文毕业证书的同时,也颁发了英文学位证书。证书以国际大学通用的表达方式,表明国立交通大学南洋学院(NangYang College)为学生钱学森(Tsien Hsue Shen)授予了“机械工程”的理学士学位(Bachelor of Science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为学位证书发放英文副本,简单而言是有利于学生、以学生为本的制度安排。按照基本决策程序,高校是否为学生制作发放学位证书英文副本,应当由高校学位办公室、或者教务部门提出基本建议,并设计出学位证书英文副本的基本格式、报学位委员会(之后是校长办公会)专门投票表决。既然是投票,就可能有两种结果,很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小问题和小争议。但这里需要提前向各高校的学位委员会成员呼吁,请投票同意:

为学位证书发放英文副本吧!

为学位证书发放英文副本吧

卢晓东